

思孟之间儒学 与早期易学史新探

陶磊著



文学丛
天津古籍出版社

XUE ZHE WEN CONG

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

陶 磊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 / 陶磊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696-670-9

I. 思… II. 陶… III. ①儒家—研究②周易—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4270号

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

陶磊/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70 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80696-670-9

定 价: 32.00元

序

陶磊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招收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要求不但要出成果，也要出人才，从而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有关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特别招收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工作人员。陶磊入学后，由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和我一起指导。我们强调学科交叉培养，因此他的论文题目选定为《淮南子·天文》的研究。这个题目是相当困难的，由于他的知识基础颇好，学习又很勤奋，终能顺利完成，取得学位。

毕业以后，陶磊博士坚持继续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读者看现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印行的他的这本《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其“自序”开头就说“这是我的第三本书”。陶磊博士的第一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第二本书是《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200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这两本著作视角新颖，内容充实，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尤其是后一本，撰稿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较多征引外国汉学家的各种成果，更是引人注目。

这三本书，可说体现了陶磊博士治学的前进历程。头一本《〈淮南子·天文〉研究》，标举“从数术史的角度”，已显示出他工作的切入点。他通过长时间的探索，揭明了古代“数术”与今人所谓“巫术”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从巫术到数术》的“绪论”中说：“就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巫术与数术的研究看，除少数学者外，大多没有将它们作有意区分……但如果从历史学的立场看，尤其是从

信仰变迁的角度看，巫术与数术二者必须分开。”陶磊博士所指出的学术界对数术研究的不足，无疑是正确的。他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论述了古代人们思想观念的“历史嬗变”。这对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自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这本新著，着眼点仍在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演进，而集中阐述“从宗教到哲学”的过渡历程。陶磊自己讲，这本来是两部书，融合到了一起。实际上，所云“思孟之间”，子思乃孔子之孙，相传师承曾子，曾子系七十子后进，子思居七十子弟子之列，而作为“早期易学”中心的《易传》，亦应于七十子及其弟子时定本形成。由此足见，这两个题目之间，彼此实有内在互补的联系，无怪乎合为一书之后，读来并没有不自然的感觉。

本书之所以择取这样两个题目，与近年出土文献研究的进步直接相关。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大量帛书，内中《周易》经传及出自子思的《五行》，受到学者普遍重视，成为研究讨论的热门。此后，不仅1993年出现的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内有子思一派的《五行》、《缁衣》等多篇著作，1994年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也有《周易》和《缁衣》等篇，为深入研究这两个题目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陶磊博士把握住这样难得的机会，就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索与判断。

我在这里要向读者说明的是，陶磊博士的书，包括前两本和这一本，可能并不是那么好读。这是因为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考虑的问题相当繁多。应该讲，其中的一些小的章节，都是足以铺陈成整本著作的。不过，您们如果仔细读下去，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这是我在这里能够保证的。

最后，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本书的“后记”。陶磊在其中声明自己“是个喜欢思考的人”，而本书“思考为主导的特点很明显”。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尽管充满材料，却不堕于繁琐堆砌的窠臼。

李学勤

2009年5月24日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三本书。对于一个自小怕读书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我出生在农村，就我小学阶段的农村教育来说，从事人文学问的研究似乎不应该成为我的理想。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比较适合做一点技术性的工作，然造化弄人，我成了一位学者。

自小从未听说过世界上有学者这样一种职业，做梦自然也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学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现在对学者这个职业已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几年对杜维明先生论著的关注，我对学者的理解就是读书，教书，写文章。

在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前，彭林先生曾赠我一册朱熹的《四书集注》，希望我能把《论》《孟》背下来，说入学后要检查。我真的努力去读了，入学时，《论语》基本能背下来，《孟子》虽背不下来，但也读得比较熟。十几年过去了，我自觉受这两本书的影响比较大。今天之所以能写出这第三本书来，与那时读熟这两本书是有关系的。不过，那时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没有想到今天会写书，更没有想到，两书对于挺起不屈的脊梁至关重要。

真正认识到两书的价值，是在去美国访学一年之后。在最近一年多的个人特殊经历中，这两本书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不少的支持。现在我对于杜先生讲的儒学要经过东京、纽约、巴黎，再回到中国，然后才能发现它的价值的说法有了别样而真切的体会。儒学必须经过自由的洗礼才能焕发其内在的生命力。

我很喜欢读顾颉刚先生为《古史辨》写的序文，从中不仅可以

学到他如何治学的，更可以体会到他与那个时代之间所发生的内在共鸣。顾先生自己是把这两方面分开的，所以他时常感到内在的冲突。我以前也是把它们分开的，所以我也时常感到这种冲突。近年，我读到杜先生关于儒家，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论说，始觉这两方面是可以统一的。由此，我对真正的学者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由对学者认识的改变，也改变了我对学术的认识。事实上，在我进入学者这个行列之前，关于学者与学术的讨论已有很多，但由于目光过于集中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心灵也比较散漫，从事学术工作十多年，自己很少严肃地思考过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当然，要准确地定位自己，规划自己一生的学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弱小，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却很大。就学术而论，传统学问家的榜样只能使我产生望尘莫及之叹。进入大学之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古典教育，而进入大学之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一度使我不知从何开始。西方的教育机构很重视对新成员的引导，印象中，我上大学时，除了辅导员给我们介绍本系的课程设计安排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讲解如何利用图书馆之外，没有受到如何从应试的学习模式向求知的学习模式转变的引导。这个引导对于一个目光狭隘的青年人来说，实际上是极为重要的。四年的大学教育，最后又以考研结束。真正为求知有效率地去读书，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而此时，再要向传统学问家学习，已为时甚晚。

读研究生阶段，除了受到必要的学术训练外，比如标点古书，彭林先生给我的指导，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的一句话，研究必须是一个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学术界普遍强调的问题意识。十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问题有大有小，有重要，有不重要，在这个层面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是可以取得共识的。但就人文学科来讲，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传统的学问观念，仍有其影响力。过去的读书人，是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他们追求的是博学以待问。裘锡圭先生曾说，只有张

政烺这样的学者才可以称得上是博导，因为张先生是很博学的一个人。据说，当年历史研究所有三位你问他什么都知道的学者，张先生是一位，李学勤先生是一位，另一位是马雍先生。其中的李学勤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我很佩服那些专精的学者几十年一直在一个领域辛勤耕耘的毅力与精神，但就历史这个学科而论，我更欣赏司马迁所揭举的贯通精神。很多问题，如果不能贯通，直接影响我们对它的领会与把握，历史学科的魅力也无法彰显出来。要贯通，首先要博学，这十多年，我一直不愿在一个领域深入下去，就是想多学一些知识，以便解决具体问题能够取左右而逢源。

以上还只是以一种理念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即科学理念。以科学理念指导人文研究，是保证研究科学性的必需，尤其是对于解决具体问题来说，科学的理念与精神是至关重要的。笔者体会，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应该多读一点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培养科学的精神，这对于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但人文研究仅仅具有科学性显然是不够的，毕竟它的研究对象是人本身，无论是历史上的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抑或是将来的人，作为一个类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之间，共性大于个性。所以，能否以及如何以科学性的基础上，凸显人文性，是人文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的认识变化所关注的中心。

人也是一种存在，他也有一个实现存在价值的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理应为人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发挥作用。学界讨论的历史学应该恢复其叙述性，实际上就是突出其人文性的一个主张。那么研究性工作能不能体现人文性呢？是不是人文性只能在叙述中反映出来呢？我个人以为，通过对研究问题的设计、选择，研究性工作同样能够体现其人文特征。研究与叙述不应该绝对地对立起来。简单地说，对任何出自研究者个人生命体验问题的研究，都具有人文性。比如陈垣对《通鉴》胡注的研究，陈寅恪对柳如是的研究，都可以说是人文性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由个人的生命体验上升到对家国命运、民族文化前途的关怀，由此出发的研究工作，也都可谓具

有人文性。学术研究不必像宗教一样关怀所有的人，更不必像快餐一样适合多数人的口味，只要是研究者感同身受，而又能使受众得到启示的研究，都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人文研究。人文性研究，所追求的首先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体验与共鸣。但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否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

这本书算不上是人文性研究成果，而是一种知识的探求。书分上下两篇，内容上相对独立。就所关注的问题而论，都与儒家的思想与学术有关。五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早期儒家与易学》的文章（《周易研究》2004年第四期），试图发掘儒家思想与易的关联。这本书的上篇讨论的是思孟之间的儒家思想，下篇讨论的是早期易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把这两篇合在一起，相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早期儒家与易学之间存在关联的认识。

从内容上看，将这两篇合在一起，有一定的合理性。两本书都是以出土文献为基础，对上古思想学术的特定方面所作的重新探讨，并且都涉及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礼与易，是上古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又都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来源。从内容上看，上篇侧重于探讨由礼而演绎出的哲学；下篇侧重于探讨易的早期历史。无论是侧重于哲学分析，还是侧重于历史架构，从中都可以看出上古宗教与哲学的关联。笔者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轴心时代中国文明的突破，会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典范意义不一定亚于古希腊的模式。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寻思孟之间的儒学与易学的关系，就会发现，无论是儒家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易学，圣人的观念在其中都占据着枢纽的位置。在儒家思想中，圣人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存在，他智慧最高，可以与天地相参。即便是主张人人皆可为圣人的孟子，圣人仍具有典范意义，他是人伦备至的模范，只是因为知天之智的神秘性消失，圣人才成为人人可以效仿的榜样。对于儒家的易学来说，圣人同样具有典范意义。作易者为圣人，而易有圣人之道四，精研

易道，也可以成为圣人。两种论说中的圣人，又都具有神秘的特征。这种神秘的特征，直接影响了两种论说中出现神秘主义的观点，两种论说都有兼具理性与神秘的特征。这种特征，本书的两部分都有讨论，此略。

推崇圣人，诉诸神秘主义，都体现了古人对智慧的追求。易是一种寻求智慧的工具，只不过其途径具有神秘色彩。同样，思孟之间的儒者，也以知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大学》讲格物致知，讲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内业》讲修心静意，然后知生。无论是外在的攫取，还是内在的修炼，知都是追求的目标。在早期儒家的弘道之术，联结内外的便是知。而儒家易学中，汇合天道与人道的也是知。知在两种论说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从宗教向哲学的发展中，对知的关注是一贯的。古人对圣的解释，或谓知天之谓圣，或以知通乎大道谓之为圣人，不管怎样界定，具有智慧是共同的特征。而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说，有仁义礼智圣五行说，有不知言无以为君子之说，这些说法中，都强调了知的重要性。对于易学来说，无论是巫易，还是数术易；无论是运用于占卜，还是由之而生的哲学论说，知都是关注的焦点。

如此说来，将两篇文字合在一起，不仅仅对于加深理解早期儒家与易学的关系有积极意义，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儒家思想学术以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

作者

2009年2月

目
录

上篇 礼与儒家哲学的展开——思孟之间

绪论 从宗教到哲学 /3

第一章 人道的展开——郭店儒简的
思想世界 /13

第一节 天命与性 /15

第二节 性与道 /20

第三节 为政与修身 /25

第四节 心一贯论 /28

第二章 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早期儒家的
弘道之路 /34

第一节 性合内外 /35

第二节 性、行分梳 /38

第三节 德、性之递嬗与礼 /41

第四节 心合内外 /44

第三章 《内业》与《大学》 /48

第一节 释“致知在格物” /48

第二节 释“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54

第三节 礼与格物致知 /58

第四章 子思《中庸》思想新论 /61

第一节 “中庸”直解 /62

第二节 与天地参 /66

第三节 君子道 /71

第五章 “思孟五行”辨析 /76

第一节 儒家的两种五行说 /79

第二节 《五行》与思、孟 /87

第三节 又一种子思五行 /96

第六章 《五行》与神秘主义 /104

第一节 圣与君子道 /104

第二节 《五行》与神秘主义 /108

第三节 早期儒家中的神秘主义 /115

第七章 思孟之辨 /120

第一节 从气性到心性 /120

第二节 从修心到养气 /123

第三节 从心意分别到二心合一 /127

第四节 内在主体性的发扬 /132

第八章 试论儒家思孟一系的主体性论说 /135

第一节 早期儒家的鬼神观 /135

第二节 内在向度的拓展：慎独 /139

第三节 外在向度的展开：行 /142

第四节 内外之间：知 /146

结语 礼与理 /152

下篇 早期易学史新探——
以出土文献为基础

引言 /159

第一章 《系辞传》“易有太极”章与数字卦
——卦为圆体理论 /165

第一节	卦为圆体 /166
第二节	易有太极章与卦体分析法 /168
第三节	重卦说、四画卦与今本卦序新论 /171
第四节	卦为圆体与系辞规则 /173
第二章	《周易》用九用六与数字卦用“十”含义试解 /176
第一节	尚乾与用九 /177
第二节	用六与尚艮 /180
第三节	洛书与用十 /183
第三章	《连山》试解 /188
第一节	“连山”直解 /188
第二节	《连山》与时 /192
第三节	《连山》之义 /195
第四章	易象源起论 /200
第一节	从物象到卦象 /200
第二节	卦象的繁衍 /204
第三节	汉易象学之流派 /208
第五章	理性与神秘之间：《周易》卦爻辞的地位 /213
第一节	卦爻辞的出现 /213
第二节	尚中与断志 /216
第三节	理性与神秘的分离 /220
第四节	卦爻辞所体现的文化特征 /223
第六章	孔子论易与三易融合 /228
第一节	三易损益 /229
第二节	三易融合之一：统一卦体的出现 /232
第三节	三易融合之二：完整易道的表述 /235
第四节	三易融合之三：器用层面的表现 /239
第七章	巫史之辨：易在占卜中的运用 /242
第一节	史易与巫易占卜的不同 /242

第二节	观象系辞的再认识 /246
第八章	《易传》与孟京易学 /251
第一节	汉易学派别问题 /251
第二节	孟京易学以岁时配卦思想寻踪 /253
第三节	易家候阴阳灾异学说溯源 /255
第四节	巫易数术化与孟京易学 /259
结语	/264
后记	/268

上 篇

礼与儒家哲学的展开——

思孟之间

绪论 从宗教到哲学

罗根泽先生在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时曾提到，“春秋及春秋以前所以经纬万端者，无不以礼。故各种学说，无产生之必要与可能。及至战国，世乱日亟，人心益诈，学者见先王之礼不能维持和平，于是各就所见，求所以维系改善之方。惟儒家仍思以礼治天下，而其所谓礼，亦益以制裁力，不若先王之只持歆动力。自余若老庄之非薄礼者无论矣。《国策》所载，诸子所论，言礼由礼之说，不经见也。则百家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亦如希腊之智者；清末民初之新学，风起云涌，有由然也”^①。如果说人类早期的一切学问都包含在宗教中，而中国古代的礼正是中国早期的宗教，用庄子的话语表述，礼应该就是古之道术，百家之学正由此道术分裂而来，那么，罗先生的这个说法中的前半部分是可以成立的，而后半部分割裂了百家之说与礼的关联，则不一定妥当。笔者认为，百家之说，皆可于礼中找到各自学说之端倪。其间或有极端反礼者，如今本《老子》，主要因其与儒家的对立，而儒家力倡以礼治天下有关。

上古之礼之为宗教，其为儒家所继承者，仍保留着诸多宗教之胎记。^②那么，儒家的哲学，与上古之宗教，与其自身所倡之礼，必有若干联系。礼与儒家哲学的展开，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上古思想

① 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载《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4页。

② 参见王启发《礼的宗教胎记》，载《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经学今论初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